

# 西南基督教教会“不吸鸦片”戒律探讨

东人达

鸦片输入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西南各族人民深受其害。而一批出身于英国社会下层和少数民族族群的传教士，却表现出反对鸦片输入的态度。西南各民族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制定了不吸鸦片、不种鸦片的戒条，并长期坚定地执行，形成一片片没有鸦片毒害的净土。而今天的教会则由传统的戒烟发展为现实的禁毒。从中可见族群与宗教因素在禁烟活动中的作用，更可见中国人民的主体作用与禁除烟毒的决心。

关键词：西南 少数民族 教会 禁烟

作者东人达，1950年生，博士，重庆三峡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

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浪潮，大批传教士来到西南民族地区。其中以柏格理、党居仁为代表的出身于英国劳动阶级和少数民族族群的循道公会、内地会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明显地表现出反对鸦片荼毒的态度与举动。清末、民国期间组建的各民族基督教教会，在这些传教士的启发下，都自主制定了禁除鸦片的戒律，并付之于严格的实施，形成的戒烟传统，今天仍然被西南民族区域的众多教会所继承并发扬。其族群与宗教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群众性禁毒经验。

## 一、鸦片对我国各族人民的危害

英国在侵占我国邻邦缅甸的时候，据严德一《边疆调查研究实录》记载，除了对各民族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外，“最后，英国人更另用两种方法：其一是用鸦片去毒化他们，如今野人山中几乎找不到没有嗜好的男子；其二是用基督教去笼络他们。才把这批野人收服了。”<sup>①</sup>

西方列强除了向我国民族地区倾销过剩商品、掠夺廉价原料外，“更为恶毒的是，帝国主义还将鸦片种子带到各民族地区，强迫各民族种植，使烟毒越流越广，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前后，布依族地区新开垦的土地‘半种洋烟’，土家族地区因鸦片‘得价甚昂贵，故乡村篱落皆遍植之’造成了毒害中国人民身体健康不可收拾的局面。”<sup>②</sup>

<sup>①</sup> 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sup>②</sup> 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8页。

“鸦片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已日益突出。不少苗族居住的县，成了全国鸦片的主要产区，其中，以贵州西部各县为最多。……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烟毒泛滥更甚。光绪十六年(1890)有外国人估计，贵州鸦片年产量为四万担，仅次于四川、云南，居全国第三位，光绪三十二年(1906)为四万八千担，在全国仍名列前茅。其他省的苗族地区，罂粟种植亦渐增多。由于罂粟种植多，吸烟者众，鸦片在贸易中的总价值，已几乎超过任何商品。”<sup>①</sup>当时，西南著名的鸦片贸易市场有云南的安平厅（马关县）的新街、仁和、八寨、古木及广南府，贵州的安顺、织金、镇宁、下司、凯里，湘西的所里（吉首）、永绥，湘西南的城步、靖州等地。

对于各族群众的直接危害，例如，“由于鸦片的日益漫延，吸食者染上瘾后，精神萎靡不振，面如土色，骨瘦如柴，严重摧残人体健康，伤害了劳动力和直接影响了生产，甚至有的卖尽家当，沦为盗贼，破坏社会秩序，给侗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sup>②</sup>由于鸦片经营获利丰厚，随着鸦片种植与贸易的合法化，一些封建地主将鸦片作为迅速发家的途径，兼并农民土地，扩大种植面积，在短期内获得巨额利润，成为农村中爆发的大地主阶层。在今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如烂土麻拱寨一户地主，原来只有几十挑田，由于做鸦片生意和发放高利贷，在一、二十年内便集中了七、八千挑田地，一变而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sup>③</sup>在土地大量集中的过程中，进一步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与阶级矛盾加剧。

民国时期，政府提出了一些禁烟措施，在西南划分出鸦片的“禁种区”与“特种区”。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认真落实，烟毒仍旧继续蔓延。地方政府甚至把抽收烟税作为最大的财政来源，如贵州军阀“周西成统治贵州时，就公开鼓励种罂粟，鼓吹‘有土必种，无烟不富’，种了的要抽‘特捐’，不种的要抽‘懒捐’，一般是照土地肥瘠程度每亩纳税三、四、五元不等，使烟毒泛滥更甚，以致‘贵州经济基础，完全建立在鸦片之上’。民国二十四年(1935)贵州财政预算中，鸦片税就有四百余万元，占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七。”<sup>④</sup>

鸦片对于人民的危害日益加深，如位于武陵山腹地的今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清末民初瘾民遍及全县城乡，不少吸食者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虽明令禁种、禁食，但都是‘寓禁于征’。民国十三年（1924），秀山边远村寨都种有鸦片，县内各重要场镇烟馆林立，县城各旅馆，都置有烟室，连官府也设有供官员吸食的烟舍。”<sup>⑤</sup>

<sup>①</sup> 《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

<sup>②</sup> 《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76-77页。

<sup>③</sup> 《水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sup>④</sup> 《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sup>⑤</sup>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秀山县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09页。

## 二、一群反对鸦片贸易的传教士

与罂粟一同来到中国西南的,还有西方基督宗教各宗派的传教士。但是,最早到滇黔川民族地区传播基督教的一批传教士,如内地会的党居仁(J. R. Adams)、属于循道公会的圣经基督教教会的柏格理(Samuel Pollard),出身于19世纪英国的工人、农民家庭及少数族群,对英国政府的鸦片贸易政策,却表现出明确的反对态度。

当时,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所遵循的传教战略是沿重要的交通线,以城镇为据点,以汉族居民为对象,在士、农、工、商阶层中布道。而最早把目光投向少数民族聚居地农村的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于光绪十四年(1888)来到贵州安顺,“其时,针对鸦片流行、危害严重等现状,党居仁开办戒烟局,宣扬戒烟好处,介绍戒烟方法,免费发放药丸,博得官绅士民的好感,拉近了距离,部分地消除阻碍因素。”<sup>①</sup>

参与内地会活动的德国基督教组织“姊妹会”的巴宽敬等女传教士,于1912年到黔西北的大定(今大方县)后,就开办了由包宽爱主持的县城第一家药房门诊。门诊业务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受鸦片毒害的人戒烟。有的人就是由于戒除了“洋烟”才皈依基督教。她们于1927年入驻黔西北经济文化中心毕节县城,“其后的发展方式是以办戒毒所(‘戒烟局’)、开医院、办学校等接近群众、宣讲教义、引人入教。”<sup>②</sup>

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传教士于1884年来到云南,在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同时,这些传教士的一项重要业务,就是在传教团驻地昆明、昭通、会泽,抢救服用鸦片自杀或误食鸦片者。如在柏格理1892年日记的结尾有一则记载,说明在该年度最后8个月里,他被请出去救治了32位服鸦片自杀的病人。柏格理将他与同事抢救鸦片病人的典型事例与惊险场面,写进《中国历险记》,被收录在《在未知的中国》中。

柏格理本人则多次诅咒英国对华罪恶的鸦片贸易,为鸦片贸易将在中国的取消而欢呼,为当地禁止鸦片而努力。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如下记录:

1891年6月:“收到几封来信。还有一条令人振奋的新闻,国会以一百六十票对一百三十票通过了约瑟夫·皮斯爵士对鸦片贸易定罪的提案。种植罂粟的许可证在印度撤消了,鸦片出售在该国亦被终止。这可谓是一个辉煌的胜利。我们为此而欢欣鼓舞。……好时光要轮到中国了。”

1892年3月1日:“数日之前,在这个城市(昭通)发生了一次反对酿酒的很有意思的闹事。去年收成不好。穷人深受其苦。而现存不多的谷粮已要被酿酒商买光了。……结果是酿酒被禁止,而谷价也马上下跌。我在传教中支持闹事,并告诉群众,我希望他们的下一次行动是扫除鸦片。”

1899年,“在九月份,我已经印出二千多册小册子,以会造成忽略谷物的观点,劝告人们不要种植鸦片。大多数人高兴地接受了它们。我还向地方行政长官呼吁,请求他帮助。他答应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付诸行动。(后来,他颁发了布

<sup>①</sup> 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sup>②</sup> 毕节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3页。

告，鼓励种植蚕豆以取代鸦片。)”

1902年10月在访问四川凉山会理彝族时，“看到一个老人以巨大的活力叙述他如何毁掉了那些随身用具——烟枪和烟灯等——向企图奴役他的鸦片挑战，令人真是振奋异常。”

1910年1月25日在昆明的见闻，“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新任地方长官发起了一场巨大的禁除鸦片烟运动。我在乡村田野再也看不到种植鸦片的地了。昆明城门的周围，堆着成千上万杆人们丢弃的大烟枪。”“这些中国自力更生戒除此种毒药的惊人成就，在我看来简直是个奇迹。”<sup>①</sup>

与其他传教士一样，虽然身后同样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殖民侵略的大背景，但是，他们所不同的，就是出身于英国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家庭与少数民族族群。

“党居仁出身于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热心于基督教事业。”<sup>②</sup>柏格理出生于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帕兹托人，生于1826年3月1日。他属于工人阶级，曾作为一名机修工在查塔姆的船舶修造厂工作过若干年。”<sup>③</sup>

柏格理夫人埃玛·韩素音(Emma Hainge)、同事张道惠(Hurry Parsons)与夫人安妮·布莱恩(Annie Bryant)、同事王树德(William H. Hudspeth)等人，都出身于贫寒的工人、农民家庭，也都长期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高寒山区传教、办学。

这群来自英国西南边远地区下层社会的传教士，在精神与物质方面，得到了本国下层社会民众的有力支持。“他在中国的整个岁月里，始终得到了来自家乡人的砥柱般的支持。从帕兹托和梅瓦吉西的渔民、科尼什的农业工人、德拉博尔的石匠到南安普敦的学徒，都情愿献出了自己微薄的收入，基督徒的信念推动了世界性的变革。”<sup>④</sup>

曾经在云南、贵州长期服务的甘铎理牧师的女儿，英国林肯大学的艾莉森·刘易丝教授，在1998年10月31日给笔者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我相信您知道英国的圣经基督教于1907年加入了循道公会联合会，但是作为一个组织，以昭通为基地的传教士群体中，包含了圣经基督教教会的一批中坚份子，他们有些人来自英国的少数民族和山区。因此造就了一段颇有特色的历史。”

据柏格理儿子沃尔特先生的追述可知，柏格理家族在历史上确实属于英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并与中国西部苗族都有一段相似的被迫向西南方向迁徙的经历。“那么，这位名叫塞缪尔·柏格理的传教士祖先的传说，就是有关康沃尔西部地区，罗马人入侵布利吞，岛上居民逃往西部山区，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名叫柏格理的部落，以及世代居住在

<sup>①</sup> 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632、660、674、744页。

<sup>②</sup> 张恩耀：《基督教在黔西北、滇东北苗族地区史略》，贵州省民族志编委会《民族志资料汇编第五集》，1987年印刷。

<sup>③</sup> W.A.Grist: Samuel Pollard (格里斯特：《塞缪尔·柏格理》)，London, New York, Toronto and Melbourne: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第1页。

<sup>④</sup> 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605页。

康沃尔直至今日这一部落后裔的传说。”<sup>①</sup>圣经基督教教会的上述成员，都属于康沃尔地区与语言系统。

对康沃尔语的形成影响至深的盖尔语的主人盖尔特人，亦称“盖依德尔人”。“英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苏格兰北部和西部山区和赫布里底群岛。约9万人（1978年），占全国人口0.2%。属欧罗巴人种，主要由斯科特人和皮克特人结合而成，与苏格兰人族源相近，但因地处边远山区，所受外界影响较苏格兰人少，直至十九世纪仍保留氏族制残余，操盖尔语，属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与爱尔兰语相近。多数人亦操英语，仅赫布里底群岛上的少数盖尔人操本民族语言。十九世纪以前多信天主教，十九世纪初不少人改信基督教新教，属加尔文教。”<sup>②</sup>

至于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以及他的同事克拉克牧师，都来自苏格兰的基督教新教会，参加了中华内地会的工作。同康沃尔的语言一样，他们的方言与古老的盖尔语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20世纪80年代英国居民的民族构成比例中，英格兰人为81.5%，苏格兰人仅占9.6%。<sup>③</sup>

在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大背景下，这些传教士将劳动者、少数族群的出身集于一身，就使他们的活动成为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因此，他们一边认真履行传教使命，一边又力主禁除鸦片，斥责列强的炮舰政策，谴责中国腐败的封建统治，同情群众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对西南少数民族怀有天然热情，并不辞艰辛，努力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教育与社会改良活动。

### 三、基督教教会“不吸鸦片”戒律的执行

就传教的指导思想与具体方法而言，同属于基督宗教的天主教与新教各宗派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在对待鸦片烟毒方面也是如此。显示出资产阶级新教与曾占据中世纪欧洲垄断地位的天主教的明显区别。

1866年，天主教法国传教士梅西满掌管贵州遵义教务，方珍五分管位于仁怀、习水交界的二郎坝教堂。该教堂最早信奉天主教的4个人中，有3人因杀人抢劫犯有官司，还有1个叫李四满，贩卖鸦片，由于偷漏关税被官府税务人员查获。于是找到遵义天主堂管事陈晓明，“李四满将事情的原委陈述一番之后，对陈说，如果教会能把鸦片得回，不但他奉教，连他一家人以及地方多数人都要来奉教。经过陈晓明出面交涉，果然将鸦片全部得回，税款一点也没有交纳。”<sup>④</sup>可见天主教教会对于鸦片采取了纵容的态度。

1903年底，柏格理在昭通炎山彝族首领龙勇泉等人的护送下到四川凉山彝族区考

<sup>①</sup> 沃尔特·柏格理著，苏大龙译：《柏格理在中国》，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89年印刷，第1页。

<sup>②</sup> 陈永龄：《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3页。

<sup>③</sup>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154页。

<sup>④</sup> 贵州宗教志编写办公室：《贵州宗教史料选辑第二期》，1987年印刷，第65页。

察。二人交往甚密，龙勇泉也多次提出想加入基督教教会。但就是因为他无法戒掉鸦片烟，并有3房妻室，因此被拒绝。具体情由可见柏格理的《在未知的中国》。

在是否禁止教徒吸鸦片烟的问题上，即便是针对同一个民族，天主教与新教往往采取不同的要求。为了同基督教争夺会众，天主教往往实行更为宽容甚至是放纵的态度，“例如，在景颇族地区，与基督教严厉禁止杀牲祭鬼活动不同，天主教仅要求教徒自己不祭鬼，‘但信鬼人家祭鬼时，也可以随便参加吃；祭官庙分肉时，也可以同样吃一份，还可以喝酒抽烟。’人们只要买一本《圣经》，经常参加礼拜便可算是教徒。”<sup>①</sup>而新教英国浸礼会则在景颇族教徒中坚持了禁烟的要求，“入教后，景颇族教徒的生活习惯跟信鬼时对比，有了进步。如见面握手问好；读书的人多了起来；讲卫生爱清洁；不酗酒、不吹大烟；……”<sup>②</sup>两种做法的结果是，天主教兴盛一时但又走向衰败，而基督教教会则长期发展下去。

禁烟戒条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西南各民族建立的教会中的一项普遍要求。“如禄劝教会宣传的‘十诫’是：不吹烟，不赌钱，不喝酒，不种(鸦片)烟，不算命，不送鬼，不拜菩萨，不跳神，不择日子，不娶妾。”<sup>③</sup>吹烟系云南民众对吸食鸦片的通称，在教会“十诫”中就有两项涉及禁除鸦片。

1937年，方国瑜先生在云南澜沧傈僳山拉巴寨调查时，在与一位信教妇女交谈中，“询信教何益？妇曰：不信教则信鬼，有疾病死亡则跳鬼说咒，酒肉之费不貲，教堂中礼拜则清高甚。且入教则不饮酒，不赌博，不吸鸦片，不作其他坏事，此入教之益也。”又询问其他教徒：“寨中有嗜酒者否？曰：无之。有吸食鸦片者否？曰：无之。且谓我寨无种鸦片者。问何故，曰教堂所不许也。近年鸦片价昂，种之可牟大利，然非教堂所许，不敢为也。裸黑山以鸦片著称，余等适春间行经其境，山谷中一片嫩绿，虽高山危岩之颠，亦有辟者。每年思茅、普洱商人数百成群而至，固厚利之所在，而基督徒所不为。历过裸黑寨，审附近种鸦片否，即知寨中有无教堂。”<sup>④</sup>即在滇西多民族聚居区域，看某个村寨的田地上是否有罂粟生长，便可得知这里是否有基督教教会存在，这已经成为一个通常认同的识别标准。

#### 四、“不吸鸦片”戒律是本土化基督教的标识之一

由于处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云南、贵州、四川边远农村多民族聚居区的教会一经建立，就显示出一种积极入世的姿态，开始了基督教本土化的进程。他们迫切地依靠自己的人力与物力建起教堂，而与教堂同时开启的还有学校，他们深知只有读书学文化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信徒们对外争取减轻土司与地主的租税与劳役，对内则开

<sup>①</sup> 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sup>②</sup> 《云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页。

<sup>③</sup> 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sup>④</sup> 方国瑜：《方国瑜文集（第4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0页。

始推行社会改良。

禁烟、禁酒是教会首先制定的戒条。柏格理在他 1906 年 11 月 19 日的日记中,记录下教会各礼拜点的负责人会议是如何做出禁除鸦片与白酒的决议。“我们召集了这里的大约 80 名执事,在石门坎举行二天的会议。我们共同讨论了一些问题,诸如吸食鸦片、饮酒,巫师,祖先崇拜,对精灵、大树、门、水、石头的崇拜,等等。他们同意采取一致态度杜绝吸食鸦片,并且完全禁除白酒。”<sup>①</sup>从中可见,如同建立教堂、学校一样,推行不吸鸦片、不种罂粟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社会改良运动,是由“他们”即我国各民族会众的意志所决定的。从一年后柏格理所记录的数字分析,禁除鸦片是信徒们遵守最好的。违反教规的共计 41 人,其中原由是酗酒、作风、信仰动摇、巫术、不守安息日与暴躁,却没有人违反禁烟戒条。

当时西南各少数民族群众种植罂粟,是为生计所迫及封建地主的驱使。鸦片的收益要远远大于一般农作物,信徒家庭放弃种植,都要承受巨大经济利益的牺牲。即禁烟的实现,不仅需要外籍传教士的引导与教会的教规,更需要中国会众主体作用的自觉发挥。

1939 年,循道公会教育中心贵州威宁石门坎的宗教、教育界人士提出,“请中央绝对象禁绝烟祸”<sup>②</sup> 这表明,在教会区域内肃清烟毒之后,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爱国情怀增强与忧患意识提高,已经开始关注西南以至全国的禁烟事宜。

从近代即形成的禁烟戒条与风尚,直到今日,仍被西南各民族的基督教会众所继承。2006 年 3-4 月,笔者以当代基督教与和谐社会建设为主题,进行了田野调查,“禁毒”则是其中内容之一。这次调查的选点有:谢正书教士(女)主持的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坎福音堂、朱学光教士主持的云南省彝良县坪子福音堂、刘小林牧师主持的重庆市万州区五桥福音堂,在归途中,还顺便访问了贵州省大方县凤山乡余显新先生负责的蒙古族教会点。这几个教会点规模不一,大到五桥的 1.2 万人,小到凤山的 70 多人。结果是,所有被调查点都是不见毒品危害的净土。

在对西南基督教会“不吸鸦片”戒律的探究中,可以发现族群与宗教因素发挥了明显作用。其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于依靠内心信仰与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监督,具有自觉性的优势与预防性的特点。当今,除了传统的鸦片之外,各种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不断出现,使禁毒工作面临日益复杂的局面。在对策方面,如果以政府运用法律武器禁毒、广泛宣传教育为主,同时充分利用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所信仰宗教的积极因素,就有利于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标本兼治的禁毒环境,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责任编辑 辛 岩)

<sup>①</sup> 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729 页。

<sup>②</sup> 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89 页。

## From Judaism to Confucianism: Studies on the Internal Causes for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Kaifeng Jewish Community

Zhang Qianhong

The history of the Kaifeng Jews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interest of academic circles. 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due to the lack of direct historical evidence,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Kaifeng Jewish Community raised many questions that still awaiting for answers.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have fully confirmed the background and external causes of the Kaifeng Jewish assimilation, but neglected the internal causes, which undoubtedly should be more important. This paper holds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Kaifeng Jews was caused mainly by ideological changes that came from within the Jewish community, which was the basic force of the Jewish identity. In other words, the Kaifeng Jews had gradually weakened their Jewish identity without any pressure from the outside world and identified highly with Confucianism. The process of Confucianization is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Judaism and Confucianism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pragmatic psychology of the Jews in the Diaspora. It analyzes the various stages of the sinicization, and the causes of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Judaism.

## On the Commandment of Not Taking In Opium of Southwest Christianity Church

Dong Ren-da

The opium import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by which the capitalist, imperialistic big powers invades to China. Southwest minorities' people were deeply harmed by it. But some missionaries who came from social lower strata and minority ethnicity of England expressed the attitude of an objection to opium importation. Southwest minorities' Christianity Protestant church drew up the commandment of not to take in and not plant opium, and they carried out it firmly for a long-term. So achieved some clean soils that there is no opium poison harm. From now, the church have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prohibition against opium into forbid the drugs realistically. The role of ethnical group and religious elements in the movement of prohibition against opium can be seen from it, the subjective role and resolve of prohibition against opium of Chinese people also can be seen from it.